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2017

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张广利, 赵云亭, 王伯承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关键词: 抽象体系; 符号系统; 决策性专家系统; 技术性专家系统; 制度性风险

中图分类号: DF43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7)04-0129-06

抽象体系(abstract system)^①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吉登斯强调,现代人类社会是由一系列制度性抽象体系支撑运转的,一方面它使安全、便利、有保障的现代人类生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由其危机引发的制度性风险成为威胁现代人类社会有序发展的主要力量。

一、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诸维度

“现代性断裂”的理论预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和结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前提和维度。

(一)现代性断裂的理论预设

吉登斯在批判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的断裂论。所谓“现代性断裂”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殊断裂,重在强调制度性抽象体系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吉登斯认为,由地域性因素,包括亲缘关系、社区文化、传统民俗等,构成的“具象体系”是传统社会运行的基础。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传统式微的社会^②,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区域化的、时空分离的。传统的具象体系已不能支撑现代社会的运行,而制度性抽象体系则能够突破地域性限制,满足人们现代社会实践的要求。

社会运行基础从具象体系向抽象体系的转变、断裂,使人类社会脱离了原有的秩序轨道,带来的是全新的生活逻辑。吉登斯看到,由抽象体系支撑的现代化并没有按照人类的预想前行,抽象体系的危机使人类社会陷入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困境之中,与传统的“自然风险”不同,抽象体系引发的风险是一种毁灭性、跨时空的“人造风险”。只有认识到现代性的断裂,才能认清现代风险的本质,并将理解断裂的性质视为分析现代性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③。

吉登斯的现代性断裂论为把握和分析中国转型风险提供了新视角,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内含着一定程度的断裂,表现为发展阶段的断裂与新时期社会结构间的断裂,这种断裂引发了社会失衡与风险^④。吉登斯的断裂论是以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西方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提出的观点。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现代性与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二元对话,而“时空压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础性结构,

收稿日期: 2016-1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系统治理研究”(16ZDA08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12ASH00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WE1222001); 上海市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项目资助(B501)

作者简介: 张广利(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guanglizhang@ecust.edu.cn; 赵云亭(1989—),男,博士研究生,E-mail:yuntingzhao0316@163.com; 王伯承(1988—),男,博士研究生,E-mail:bochengwang@mail.ecust.edu.cn

①所谓抽象体系是指一系列由专家生产的不受地域限制就能进行交流、应用、评价的制度系统,它是现代人类理性扩张的产物,主要由符号系统(symbolic systems)与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两部分构成,而专家系统又包括技术性专家系统与决策性专家系统。抽象体系主要具有专业性、抽象性、脱域性与脆弱性等4个基本特征。

即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风险是复合性的^[4]。

(二)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

现代风险认知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以吉登斯、贝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认知取向,认为现代风险是人类行动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是以拉什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认知取向,认为风险是人们主观建构的产物,现代风险增多是因人们的风险意识增强了。

吉登斯认为,现代风险是人们例行化和区域化构建的抽象体系危机的客观结果。抽象体系一方面通过其抽象性与脱域性满足了现代社会区域化的实践要求,另一方面,其专业性为知识社会中的普通大众提供了情感上的信任和“保护壳”。作为人类理性的建构物,抽象体系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现代风险客观存在的根本原因。吉登斯强调,现代风险是人类行动的必然产物^[5]。

吉登斯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并不排斥建构主义的观点,建构的风险与客观的风险都是现实的风险,都应该给予重视和研究。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不仅仅停留在认识上,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指向风险的应对问题,只要影响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都会纳入治理范围。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既有制度转型引发的风险,又有人们风险意识增强后建构的风险。

(三)制度和结构的研究视角

关于现代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有3种视角,分别是以吉登斯、贝克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视角,以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视角,以卢曼为代表的系统与结构视角^[6]。吉登斯从现代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对现代风险的根源、生成和应对进行了深刻分析。吉登斯对结构的理解和对制度性抽象体系的理解密切相关,他将结构分为表意结构、支配结构与合法化结构^[7],而制度性抽象体系主要由表意的符号系统(symbol systems)与代表规则和技术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两部分构成。

制度性抽象体系的“自反”是现代风险的根源,也即现代风险是制度性抽象体系长期成熟的结果。制度性抽象体系是人类主体性不断扩张、知识反思性运用能力不断提高的产物,吉登斯非常强调人类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但是他也认识到人类能动性是有限的,制度性抽象体系必然会产生意外后果。在对制度性风险的分析中,处处可以看到其结构化理论的影子,当结构环境与行动者张力过大时,就会产生社会风险,而当两者相互融合时,社会良性运行。即便如此,吉登斯仍然强调,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制度性风险困境的出路。

相较其他风险分析,吉登斯从制度视角对现代风险的分析更加深刻,抓住了现代风险的本质。从制度视角对现代风险的研究也遭到了重视“边缘群体”的风险文化理论的批判,制度性风险理论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的风险社会中,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无法准确描绘人们当前面临的景况^[8]。

吉登斯指出,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化,作为社会运行基础的抽象体系,其危机不断显现,整个社会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成为现代人们行动的主导逻辑,主要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功能异化产生社会的文化风险(意义的“空虚化”)、决策性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造成政治风险以及技术性专家系统与技术风险。

二、符号系统的异化:意义塑造的扭曲与文化风险

符号系统以一种塑造社会文化意义的形式存在着。“人是一种符号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9]在“第二现代社会”中,符号系统正经历着严重的功能异化,必然会引发意义世界的“空虚化”,进而产生文化风险。

(一)符号系统及其意义塑造

符号系统主要是指一系列内含丰富意义的象征符号,例如,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象征正义的符号、象征道德的符号等。符号系统属于社会结构中的“表意结构”,本质是一种意义系统,即人类文化的象征,是意义外化的呈现。

符号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产物,人们通过符号标识事物,赋予其特定意义,这种特定意义或是社会文化约定俗成的,或是专家系统所建构的,还可以是国家法令所规定的,但无论何种,符号的象征意义必然是人们所公认的,具有一定的认同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经过时间的累积以及在特定空间内的传播使其具有社会意义,而人们将其中的社会意义储藏起来,形成自身的“知识库”。另外,符号的象征意义一经形成,便会卷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的行为中介,为日常生活的“例行性”(routine)展开与再造提供条件,进而不断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整个社会的意义世界。符号系统的意义塑造一方面使整个社会是相互信任的,

高度整合的,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着;另一方面意义的脱域以及重新嵌入,加强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意义沟通和整合,进而形成一种“符号秩序”。每个国家的纪念日、相关仪式、群体称号、城市标志、图腾等等都会给人一种认同感和信任感,并能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促进社会的整合。符号系统正被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所渗透,意义塑造的功能正经历着扭曲化。

(二)意义塑造的扭曲:符号系统政治化与资本化

符号系统本是社会的意义塑造系统,是人们用来表达、寄托和积淀意义的载体。“表意的各种结构也同样承受着权力在社会生活里无所不在的影响”^{[8]96},符号系统不断受到政治权力的利用和影响,成为政治权力表达的工具。尤其在愈加网络化、媒介化的社会中,政治力量获得了更多的施展手段和平台,他们通过操控大众媒体,消解已有的意义符号系统、创造新的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符号话语。这在西方国家的政治选举中尤甚,他们要为自己的竞选造势,进而攻击阻碍与其竞选的符号系统,比如在美国两大政党的竞选中,两党势必会为自身拉到更多选票而攻击对方的政治宣传语、政治文化符号等等。这样的相互攻击,造成普通大众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符号的信任度降低,产生合法性危机。

受自由市场观念的影响,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技术经济机制支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符号系统沦为资本积累的附庸,这是世界各国从以人情维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也出现符号系统资本化的趋势,例如,出现“白衣天使”救死扶伤、“园丁”教书育人要“红包”、城管执法不公正、国庆节变消费节等现象,象征权威、正义的符号系统出现消解趋势,出现“民不信官”“患不信医”现象;中国城市历史空间的仿真化发展,本质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符号资本化的过程^[10]。

政治化与资本化使得符号系统的意义塑造功能不断扭曲,符号中充斥的是政治、资本,整个社会呈现一种虚无状态,文化风险在其中不断衍生。

(三)符号系统的意义虚无:文化风险的衍生

符号系统作为社会意义的塑造、支撑系统,当其意义变得虚无,也就意味着社会变得虚无,每一个人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活在当下成为人们的追求,这必然会引发文化风险。

政治化与资本化将符号中的象征意义掏空,使其内含的仅是一系列利益性极强的“虚假意义”。这种虚假意义是空洞的、流动的、虚幻的,无法为社会系统提供意义支撑,同时,它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渗透进每一个人的思想,“人和万物都毫无例外的被贬低成一种机能的角色,丧失了其‘本质’和自主性”^[11]。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社会成为“符号社会”,已没有社会意义可言。“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拟真的超级现实吸收了。以后,拟真原则将代替过去的现实原则来管理我们。目的性消失了,我们将由各种模式生成。不再有意识形态,只有一些拟像。”^[12]

符号系统的意义塑造功能是建立在其象征意义基础上的,当符号系统的意义被掏空时,充斥着现代社会的是形形色色的无意义符号,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这种无意义符号包围与影响,失去了意义。在这种无意义世界中,人们通过对无意义符号的狂热迷恋与追逐来寻找存在感和“意义感”,极力做到外表的“与众不同”成为“意义”实现的方式。就这样,“失意符号”塑造着个体,个体追逐着“失意符号”,人们对光怪陆离的“失意符号”的消费成为符号进一步失意的动力。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社会个体成为“失意个体”,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再有认同,不再有归属感,人们彼此漠视甚至敌对,社会被一种不健康的文化所笼罩,其结果是“公共人的衰落”,进而衍生出道德滑坡、恶性竞争、金钱至上等一系列文化风险。

三、专家系统的失信:政治风险与技术风险的二维呈现

专家系统的失信主要是指当专家系统做出的决策或创造的技术引发大量风险并且无法有效应对时,普通大众会对他们失去信心,专家系统失信的过程也是政治风险与技术风险产生的过程。

吉登斯将国家运行所依赖的资源分为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①与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②。权威性资源的生长依靠的是决策性专家系统的制度建设,而配置性资源的满足是靠技术性专

①“权威性资源”指的是行政力量的源泉,它是靠一系列的支配手段获得的。但是,这些支配手段并非是依靠暴力取得的,而是依靠一系列社会制度等间接手段获取的。

②“配置性资源”主要是指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取得的物质资源。

家系统的技术创新,它们共同创造了安全而有成就的现代社会生活。当决策性专家系统与技术性专家系统失灵时,分别会产生权威失效的政治风险与技术失效的技术风险。

(一)决策性专家系统与政治风险

决策性专家系统是指由多元的不同领域的决策性专家队伍及其创造物——社会制度构成的体系,目标是增进权威性资源的增长,保障大众日常生活的开展。当人类社会的众多事件(例如,生育等)脱离自然轨道时,人们对事件越是做出积极的决策,带来的风险可能会越多^[13]。人们在构建与再造秩序的同时也蕴含着制造风险的可能^[14]。这里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政治发生动荡、不稳定的可能性。吉登斯从制度理念的选择性、专家系统间的利益博弈与专家的“有限理性”3个方面进行分析。

1.决策专家系统决策理念的选择性与政治风险

制度理念是指导决策专家系统进行制度设计的理念,规约着制度的设计、开展和取得的成果。决策专家系统在选择制度理念时,容易犯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理想化倾向。结果是制度理念的“悬置”,造成理念与现实脱嵌,进而引发风险。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认清现实国情,延续了左的革命思想,产生严重的政治动荡。另一种是利益化倾向。主要是指制度理念被短期发展所“套牢”,造成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的脱嵌,用未来换当下的发展,造成贫富分化严重,群体之间相互对立,导致政治不稳定。纵观中西现代化的进程,都是在“发展主义”理念的支配下实现的,发展主义的制度设计理念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

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特殊性和国家体制决定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一个好的顶层设计需要正确的决策理念,也就是说决策理念要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并有利于未来的长远发展。例如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问题,这就需要在充分调研、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决策理念。

2.决策性专家系统间的利益博弈与政治风险

吉登斯认为,决策专家系统的抉择关乎的是一项社会制度能否被选择与落实,本质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决策专家系统之间的恶性利益博弈,会对相关群体的利益获得产生重要影响,并造成整个社会心态的失衡。决策专家系统间的利益博弈本身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心理情绪,使人们对决策专家产生不信任。利益博弈下的制度选择和执行过程,会打碎一些非收益群体的心理期待,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当决策选择被资本利益集团所控制时,做出的政策决策是为特殊利益服务的,会损害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加剧官民矛盾以及阶层对立。通过恶性利益博弈建构而成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不作为,讨价还价,甚至是反抗,进而激化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容易引发群体之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失序。决策专家系统无论是由于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制度偏差,都会引起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不满,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

3.决策专家系统的“有限理性”与政治风险

社会个体及社会组织的理性是有限的,主要包括知识有限性、认识能力有限性与“决策理性”的有限性,它们会在不同方面产生决策风险。在精细化的现代社会,专家系统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专家系统对外获取的决策信息只是部分信息,甚至是虚假信息,专家系统很难准确把握决策的情境、条件。面对人类社会与复杂环境的持续性互动,专家系统的认识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使专家系统无法准确把握社会系统和人类活动的复杂性,作出的决策一旦进入社会系统,会受“接续效应”与“复合效应”的影响,产生种种意外后果^[170-71],造成工业社会的制度成为其自身的掘墓人。再者,决策目标的制定以及制度的建构会受到自身价值判断等感性因素的影响,决策过程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总之,面对复杂社会问题,专家系统的有限理性会产生大量决策风险。有限理性是社会不确定性与风险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由这种‘有限’的个体组成的任何组织也就不具有自觉建构整体社会运行规则的能力”^[15]。吉登斯认为即使世界是一个单一系统,风险也会存在。

(二)技术性专家系统与现代社会风险

技术性专家系统是指由现代技术专家及其产物——技术所构成的体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跨越,最根本的动力是现代科技的发展。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为社会创造物质资源的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技术风险作为“人为制造的风险”,根源在于技术专家系统,具体体现在技术的不可控性、精细化分工与道德伦理塌陷的交叉作用。

1. 技术的不可控性是技术性风险的根源

技术性风险的本质就是技术失控,即没有按照专家设计、预想的理路运行。技术专家因认知结构的局限性无法准确掌控技术创造的整个过程,现代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流动性,加剧和扩大了技术专家“无知域”,技术在应用于社会环境中时,两者的反应会更加复杂,有更多的意外后果出现,技术创造在封闭实验室中完成,而应用环境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当实验室中的技术应用于社会环境中时,“未预见到的因素就可能使之以意外的方式‘工作’,甚至出现技术工艺与科学规定的模型相反的情况”^[16]。这多方面因素的结合造成技术的不可控性,技术专家对自己发明创造的技术无法操控,对技术出现的故障无法修复并作出解释,整个社会被不确定性所围困,“生存性焦虑”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2. 技术专家系统的精细化分工与技术性风险的复杂化

“社会学家们常常用‘分化’或‘功能专门化’概念来讨论由传统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变(transformation)。”^[318]技术专家系统的精细化分工意味着专家解决的问题有着精确的界定和边界,边界内的是专家,而边界外的全部是“外行”。技术专家系统的精细化分工已经达到一种“登峰造极”的水准,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是技术合体,而它们可能是由成千上万的技术专家所完成。现代社会分工在越加精细化的同时,也愈加对立化,各自为战。同时,由于现代专家知识是高度反思性地被利用的,必须保持持续性的内在完善或增效^[17]。精细的专业边界,各自为战,甚至相互攻击,再加上快速、持续性的更新,都在增加专业技术整合过程中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作为掌控权力的决策性专家系统与技术性专家系统,正走向合谋。当科技专家不再纯洁,不再具有独立存在性,当权力不再为民所用,不再维持社会正义,当两者为了各自的特殊利益而结盟时,他们制造的风险会突破社会的容忍度,引发社会动荡。技术与权力的共谋操纵着风险的运行过程,从风险的界定、风险的传播、风险分配乃至风险评价。操纵的最终结果是风险制造者一方面实现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将自己制造的风险通过制度等等转移到公众身上。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风险转移造成了国家间的冲突,恐怖主义集团的诞生与扩大,从国家内部来看,风险转移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官与民、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

3. 技术专家系统的道德伦理塌陷与技术性风险的加剧

技术非自然物,是由专家发明创造的,具有极大的改造能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技术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负荷物。技术专家系统的道德伦理被内外因素不断销蚀。外部社会环境方面,由于科技理性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支配,造成价值理性空间被挤压,征服自然,摆脱宗教与传统的束缚,最大限度地追求主体自由成为时代主题,技术专家被这一时代主题所绑架,在发明创造技术时忽略了自身的道德伦理。从技术专家自身来说,技术专家系统本身就有一种“科学主义”的价值倾向,认为发明创造“应当不计利害地探索真理而不管它会引起什么后果”^[18]。另外,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也催生了技术专家的功利主义倾向,利益成为他们的价值追求。当技术专家系统的道德伦理塌陷时,他们更多地将技术创造能力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挂钩。当技术专家失去价值约束,沦为一种冷血的“殖民工具”时,巨大改造能力会成为一种风险毁灭力量,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19]。

四、余论

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类型是现代制度性抽象体系的危机所致。面对现代制度性风险,吉登斯认为人类应积极卷入到现代性的重建中与现代风险进行搏击。另外,他强调这种搏击性行动要与工具理性“分道扬镳”,应以反思性的“生活政治”指导制度系统的建设,以重新恢复人们对现代制度系统的信任。吉登斯强调反思性发展是应对现代风险困境的策略,而反思性发展的根本是反思性的制度建设。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吉登斯强调,只有通过反思性的制度建设才能“在制度失范的风险社会建立起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既能增加对风险的预警机制又能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20]。

吉登斯从制度主义视角对现代风险的分析 and 应对,对中国社会应对转型风险有诸多启示。第一,制度主义视角对理解国家的转型风险具有恰当性。从历史主义视角来看,起于近代的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建构,而适于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建构则滞后、空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却无法支撑、巩固和完善整个社会的协调。第二,抽象体系的脱域警示“制度同行性”

风险。抽象体系的脱域以及嵌入是以适宜的特定时空域为前提的。中国区域跨度大,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制度的差异性运用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当前出现制度复制的趋势,即落后区域不顾区域之间的差异效仿发达地区的制度,会造成制度运用的潜在风险。第三,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要谨防由符号系统政治化与资本化产生的文化风险。最后,对于国家的专家系统体系,反思性的制度建构至关重要。受历史因素和国家体制的影响,各级决策性专家系统更多承担制度执行的功能,而缺乏反思性。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周红云,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68.
- [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3.
- [3] 孙立平.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4] 景天魁. 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J]. 社会学研究,1999(6):55-66.
- [5] 李猛. 论抽象社会[J]. 社会学研究,1999(1):1-22.
- [6] 张广利,许丽娜. 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三个研究维度探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8.
- [7]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李康,李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6.
- [8] 杨雪冬. 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1):87-90.
- [9] 恩斯特·卡希尔. 人论[M]. 李小兵,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35.
- [10] 张佳,华晨. 城市的文化符号及其资本化重组——对国内城市地区仿真更新的解释[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5):163-168.
- [11]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张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5.
- [12] 波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
- [13] 吉登斯,皮尔森.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 尹弘毅,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77.
- [14] 潘斌. 风险的政治化与政治的风险化——对风险政治学的批判性尝试[J]. 山东社会科学,2014(3):16-20.
- [15] 陈忠. 制度创新:风险与选择[J]. 教学与研究,2005(7):30-33.
- [16] 赵万里. 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3):50-55.
- [17]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33.
- [18] 贝尔纳. 历史上的科学[M]. 吴况甫,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89.
- [19] 乌尔里希·贝克.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45.
- [20] 庄友刚. 风险社会理论述评[J]. 哲学动态,2005(9):87-90.

The Crisis of Abstract System and Modern Risk: A Study on Giddens' Institutional Risk

ZHANG Guangli, ZHAO Yunting, WANG Bocheng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Giddens believes that modernity is a kind of institutional modernity supported by a series of institution. And then, he argues modern risk is a kind of man-made institutional risk in essence. Abstract system inherent in modern institution is the kernel of modern institution and it mainly includes two dimensions consisted of symbol systems and expert systems. So, the abstract system also becomes the core concept of modern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that Giddens understands and analys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essence of modern risk from the crisis of symbol systems and expert systems, to understand the Giddens' institutional risk theory more fully and accurately and provide the relevant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 of our country's institution.

Key words: abstract system; symbol system; policy-making expert system; technical expert system; institutional risk

[责任编辑:箫姚]